

# 一、日本人的自我

## 1. 胳膊扭不过大腿

自古有句话：“非理法权天。”这是楠正成 旗麾上的五个大字，同时也是战争期间特攻队司令官好说的或写在队旗上的话。“非”是无理的事，“理”是道理，“法”是法式，“权”是权力，“天”意味着天道。

“非”负于“理”；“理”负于“法”；“法”负于“权”；“权”负于“天”。不懂这五条 就是“不明事理”。在德川时代<sup>②</sup>的武家的戒律中即有这一条。

这样，权威、权力虽然服从天道，但在人类社会里，它强于法、强于理 逆其而行即不安分。这样的认识 从德川时代至今，虽然形式有变化，但根深蒂固地留在日本人当中。

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来说 这种劝说服从

楠正成（楠木正成，1294-1336），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，愚忠于大势已去的后醍醐天皇，1336年以微兵于兵庫湊川迎战足利尊军，兵败战死。战前曾被军国主义捧为日本历史上忠臣的代表人物。

德川时代（1600-1867），由在江户的德川幕府执掌全国大权，亦称江户时代。

的训诫，被认为是首先应当铭记在心的。

在德川时代，把荷兰的自然科学介绍到日本，掌握了合理的思想方法的西川如见（1648-1724）这样的人也说：“总之，下民非治人之任，治于人者唯平常心专之，且不可有些许计谋之意……”（《百姓囊》）

对于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来说，把这种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心理植于民众之中，是维持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远在教育敕语公布以前，明治十二年（1879年）当时的内务卿伊藤博文建议建立抑制批判权力精神的教育政策时说：“无益的政谈过多，非国民之幸福。”众所周知，日本教育着眼于培养服从心，而这种服从心又是以对天皇的忠诚为最高道德的。“要时时听从天皇陛下的话，天天拜谢天皇陛下、皇后陛下！”从小学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教育。

可是，服从精神与其说是这种德育的结果，莫如说是通过语言、暴力，把对权力的恐惧意识灌入人们心里形成的。作为胳膊无法扭过的大腿，直接反映到日本民众眼里、耳里的权力，不必说首先是衙门（官僚）、巡警（警察）、军人（军部）。

最经常被用来对孩子进行服从精神教育的道具是巡警。

“不听话，就喊巡警来了！”虽然今天在城市里已听不到这样吓唬孩子的话了，但农村还不断使用。在东北农村里，小孩稍一淘气，老太婆们就会说：“我可要报告巡警了！”（大牟罗良《农村的世态》载《东洋文化》12期）

不仅限于农村和孩子，就是城市的大人，今天，害怕警察的也不少。

总理府舆论调查研究所最近作了个“关于警官态度的舆论调查”。其中有因某种原因被警察署叫去作参考人的人，他们谈了在警察署所受的“待遇”，清楚地表明：日本的大人们至今还

感觉到警察是“可怕”的。

“虽说是作为参考人叫去的，但一开头便吓唬你一顿，实在害怕，可怕极了，讨厌死了。”（栃木县 经营饭馆的妇女，25岁）

“警察没有说话客气的，这是第一点。警察那地方就是可怕的地方。”（秋田县 做小买卖的妇女，30岁）

民众对警察的恐惧是以警察是“扭不过的大腿”这种服从心为基础的。

“警察的工作是训人，人是挨训的，但挨训要得法。在警察面前一味辩解，反而会留下不愉快。做错事只有爽快认错，赔礼道歉。”

这段文字引自1953年出版的《结交人的方法》（清水正己著）一书介绍的庶民处世法。这位作者还介绍了接触官吏的方法，其八条结论的第一条是：“由始至终以低头赔礼为好。”看到有这样内容的书在今天出版，令人感到服从的精神，真不容易从日本人的心里除掉。

与警察同样，衙门口也屡屡扮演着使人从恐怖到服从的精神教育的重要角色。

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官衙的“问话”也会引起不小的恐惧。民间的研究人士进行社会调查和报纸作舆论调查时，可以常常感到这一点。

“在岩手县的农村接受调查的一个农民问道：‘这是衙门的问话吧！’‘怎么填写才好呢？’……这是日本衙门的命令，还是美国佬的命令呢？揣度过来揣度过去。……同时还思虑着：‘怎么填写才好呢？’”（《农村的世态》）

这样一来，农民回答调查的基准是他们的“不触犯鬼神，鬼神不会作祟”、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的人生哲学。填写出的具体回答多会令村里头面人物感到满意。（同前书）

这样的对村里有权势的人或官衙的服从心，不单单来自恐惧，也有受利欲的驱使的一面。这是伴随着奉承的服从心。前面举出过的《结交人的方法》的作者，就是想要最露骨地普及这种服从心的一个。他说：“奉承官吏——这决不是出自封建思想的想法。官吏有‘老子是官’的自尊心。这是否叫封建思想？我们不了解，这是对方的问题。我们只要迎合这种心情去作，就可以了。”

出自利用官吏之心的阿谀奉承，最有效的是日本独特的“宴会”。因此“有官吏出席的宴会，……不论是何种聚会，通过对官吏的奉承都可顺利地达到聚会的目的。就是单纯的联络感情的会，日后都可得到官老爷们好意的体恤。”（《结交人的方法》）

虽然基于利欲产生的服从，原本是表面上的东西，内心里是把官吏当作傻瓜利用的。但是就是表面上的应酬，如果总是被这种服从官衙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拉住脱不开身，不知不觉地就会在人的心里植入服从的习性。于是，在官吏面前，“(1)始终低头赔礼；(2)不辩解；(3)表感谢之忱；(4)有慰其劳苦之心；(5)敬请关照；(6)莫以一般友人相待；(7)更不可以公仆对待；(8)使双方关系亲密无间。”《结交人的方法》日常把这“八条”挂在心里，并依样而作，如不养成对权势的服从习性反倒奇怪了。

不过，以最短的时间彻底制造服从的场所，不言而喻，是军队。

军队是把青年置于处罚的暴力恐怖和向上爬的利欲诱惑之中，使他们变成卑贱、服从、乖巧这样的怪物的场所。

《军队内务规则》中说：“兵营系苦乐生死与共之军人之家，兵营生活之关键在于起居之间，培养军人精神，熟悉军纪，实现

巩固之团结。在野间宏的小说《真空地带》中登场的大学生兵曾田把这一纲领修改为：“兵营系被条文和栅栏圈住的一块四方空间，是靠强大之压力制造出来的抽象社会。人在其中被剔除人之要素而成为士兵。因此‘确实’兵营是没有空气的，它已被强大的力量抽除。与其说它是真空管，莫如说它是制造真空管的地方，是真空地带。人在里边，被夺去一定的自然和社会，终于成为士兵。”

这样的真空地带把人制造成具有不抵抗、绝对服从习性的“兵”。

在关于日本军队的研究座谈会上，旧陆军的军官们谈到暴力服从精神教育：“为给士兵灌输不论缘由绝对服从的观念（长官问）‘为什么这样干？’奴士兵回答如此如此才决定这样作的就会一巴掌打过去：‘不要强词夺理！’如不回答也会大打出手骂道：‘为什么不说话！’说明理由挨打，沉默也挨打。结果只有回答：‘是’‘是’最好。（饭塚浩二《日本军队》，1945年）

既然不论怎么作都会遭致暴力，那么顺从地说“是”“是”，挨打相对可能少些。士兵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。结果人非人，完全变成无气力的活动机械，连自我的一层碎片也荡然无存。

入伍当初，还多少希望在残酷之中看见人与人之间一丝温暖的青年们，不久便完全绝望了：“连以为不错的战友也越来越露出本性。一天打两次。兵营内没有一个象人的人。自己也感到自己离人越来越远了。”（福中五郎《听海神之声》，1952年）

逐渐被夺去人性的士兵是活着的尸体，如想要恢复人性将

野间宏（1915— ）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。《真空地带》出版于1947年，它以军队的内务班为舞台，通过木谷一等兵的遭遇，揭露了军队机关的反人性。

遭濒临死亡的处罚。“上星期日，依旧是藏在厕所里给母亲写信，那时我无法止住泪水。虽然我告诉母亲我精神很好，但真实的心情如同死人一样悲惨。如果这样写被上等兵发现了，将会被他们杀死的。”（同上书）

海军和陆军没有什么不同。《战舰大和的最后》一书有一段描写甲板官殴打入室老兵的情景：

“进室的脚步、敬礼、言辞、顺序等 都有规定 如果挑刺儿没完没了。因此，入室是士兵从一开始就忌讳的事。

“一名老兵遭到军官的怒骂，他迟钝地反复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……

“抡起教训士兵的棒子，钝实的打扑声，老兵屁股挨了一棒，背朝上倒下，青黑的脸贴在地板上，痉挛地扭动着身子。”

这样的暴力行为，终极主要目的是培养服从精神。在同一书内，作者和另一军官就殴打士兵当否有一段问答，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：

“发现不对而不打 有这样的军官吗？”

“是的 如不只考虑自己 我也曾认为是正确的。”

“你所在的是什么地方？是在牢狱之外的自由世界吗？”

“是军舰。”

“在战场上 军官再通情达理 都没有用 必须严厉。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。”二人两眼相对片刻。”

“你的话也有一点道理 我明白——但是看一看：在弹火之中 是我的兵能打仗 还是你的兵能打仗 那些对长官‘是’‘是’的兵，就是枪林弹雨也向前冲，而你的兵能否这样？……”

用这种暴力方式强制士兵服从，不久即把服从的习性完全植入士兵心里。这种服从的精神状态，就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个人的念头和欲望，最大限度地扩大响应上司要求的余地，不论

时命令一下，即应声而动。

换言之，军队的生活就是逐步抹杀个人的自发性，制造象机械那样应令而行的习性的场所。关于这一点，一学生兵说：“以我自身的经验而言，军队生活的痛苦不在于日常生活的肉体的过度劳累，而在于随时需要服从他人之意志立即行动的待机中的紧张感。再有需要不时地留意他人，主要是老兵对自己有什么要求，自己应怎样行动，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完全受到窒息。”（《农村的世态》）

于是，多数的士兵不久即变成连‘自己意志受到窒息’也感觉不到的机械人。当然这种非人性，每一个青年因个人情况不同，感受也不同。比如来自农村的士兵，特别是家庭中的老二、老三，很多人入伍前在家庭的人际关系中即养成了服从的习性，因此有人反而容易适应军队生活。

据前面已引用过的岩手县的农村调查，“特别是与家主同住的老二、老三夫妇……，很多行动非常迟钝，行动的表面虽然使人常常错以为他们无拘无束，而实际精神上决不快活，他们经常顾虑周围，行动慎重。以这种方式生活，一直到分家以前，他们名副其实地要为家主‘灭私奉公’。因为将来分家时，将依据效劳的程度，决定分享多少财产。”可以说，“他们在入伍以前已在农村社会干了新兵应干的事。”所以“被人认为呆笨、老实的农村青年，在军队里应付老兵等，得心应手，能够博得相当的信赖，一次就获得被提拔为上等兵的荣誉。”

年龄(岁)	男%	女%
16—19	17	14
20—24	30	22
25—29	27	28
30—39	38	35
40—49	35	38
50—58	40	43

上述军队的服从精神教育，在战争中，被很多人称赞为不只是军

队的，而且也是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的理想。就是在战后的今天肯定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这种习性的人还很多。

据总理府国立舆论调查所《关于社会教育的舆论调查》(1953年3月)对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持肯定态度的人所占比率如前表。

虽然不能认为实际情况完全如数字所示，但这一数字大体上表明30岁以上的人，今天依然有相当多数支持服从的倾向。

## 2. 灭私奉公

这样的服从精神，在制造自动服从权威的习性的同时，阻碍着自由的自我生长。而反过来，通过尽量不使自我生长的训练，又能够强化服从的习性。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这句话与古时说的“无我”是相通的。

德川时代讲解处世态度的心学<sup>①</sup> 满篇都是劝人“无我”。就是说 要忘掉自己 勿“放纵”，专心致志地为长上之人“奉公”。<sup>②</sup>

心学之本，是让民众忘我弃欲，使他们变成忠实地默默地完成自己所负工作的奴隶。这是心学的最高德目。《续鸠翁道话》<sup>③</sup> 说：“无私心 唯至善 我则无。”“无我事人 不知事人。如知事人 谓有我……奉公自觉竭诚者 非真也。”

心学，专指江户中期石田梅岩（1685-1744）及其门人综合日本神道和儒、佛的一些伦理观念创建的一种道德学，亦称石门心学、道学。

<sup>②</sup> 奉公，不仅指封建时代奉公当差的人和行为，如仕奉主君（领主）的武士 同时也指其他侍奉他人的行为，如农民在地主家当长工，贫民在作坊中作学徒，在财主家作杂务等。

<sup>③</sup> 《续鸠翁道话》和《鸠翁道话》，皆为江户后期的心学者柴田鸠翁（1783-1839）的代表作。

“无我”一直到不自觉有自己 才是灭私奉公的精神，一切自发性都斥之为“不羁”而被摈弃。因此 孝顺父母也必须“唯双亲为重 弃我身无一顾 真无我也。身无不羁 羁绊自无 此无我，难得之佳境也。”（《鸠翁道话》）

在心学中，“灭我”是町人<sup>①</sup>的最高道德，“唯思善恶之心 即我。此我若灭 性至善 依天道之善事即增矣。”（《松翁道话》<sup>②</sup>）

“灭私奉公”同样是武士的精神，“……我身我命非我之物，何时主君命下 当即以身命报主君……”（《武道初心集》<sup>③</sup>）

第二次大战中出版的《臣民之道解说大成》，倡导国民对天皇“灭私奉公”照搬了上述武士道的话：“此身此心以仕奉天皇为本分。吾等之生命似我之物，又非我之物也。”

前面已引用过的《日本军队》一书中座谈会的发言，也强调说：“军人精神”就是“无我”精神，“以今天的话说 即忠实地履行赋予的任务。考虑个人就是不忠。”

在这里，自我被视为不忠的标记遭致摈斥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逻辑 不论干了什么事 都不是自发的 自己都无责任 都是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，即朕的命令而被动干的。因此，战后作为下级战犯被处刑、处罚的低级军官、士兵 很多主张自己无罪，愤慨地要求追究下命令的上司的责任。一个杀害了美国 B29 轰炸机被俘飞行员的下级军官 被判死刑 后来减刑为25年徒刑。他说：“美国飞行员 确实是我杀的 但并非密谋 或由我主动干的。那是上司的命令，那命令是绝对的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同大元帅的御音一样。”（饭塚浩二《自那以后七年》）

<sup>①</sup>町人 江户时代城市的商人、手工业者。

<sup>②</sup>《松翁道话》，江户中后期的心学者布施松翁（1725-1784）的代表作，布施为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的弟子。

<sup>③</sup>《武道初心集》江户中期兵法学者大道寺友山（1639-1730）的代表作，

军队完全禁止个人的“主动”，每天的生活完全被封闭在外部强制的禁锢之中。

当然，起初也对这种禁锢强制性有感觉，自己也有意识地约束着自己服从命令，但是时间一长，不断地机械式地重复着服从的行动成为习惯而且对这种行为的疑问、批判也一直被禁止，不久便会忘掉被强制禁锢中的自己成为“无我”状态。这样就从抹杀自我产生出服从的习性。

军队的教育认为从命令到行动，反应的时间越短，越是好军人。“命令一下”这句话，即指在命令刚一发立即自动实行的习性。正象有一个下级军官所说的那样，“彻底地敲打个人的批判性”十分重要，“只念过小学的士兵，上司一叫，会立即应声‘是’跑过去可是中学校出来的人由于沾染了一定的自由的空气，却很不容易做到这样。”军队的生活是名副其实的“真空地带”它抽出了培养批判精神的“自由的空气”。

服从的习性一旦养成，不论干什么，都不会令人感到它的服从是勉强的。对于他听从命令行动，仿佛是自然的要求。“或许可以说已把义务内面化了，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主观上自发的行动，而不是遵从外部规范的行动。”（《日本军队》）

这样的服从习性进一步增强，如不在固定的框框内行动反而会感到痛苦。换言之，不依命令重复固定机械式的行动就不自在。比如士官学校预科每天早晨去遥拜<sup>①</sup>场所面向皇宫方向鞠躬，起初这样做感到很痛苦需作一番努力可是渐渐成为习惯以后，如果不去，这一天都感到不舒服。……有时早晨因故去不了就夜间去。”（《日本军队》）

服从的习性使人不生活在命令或预定的框框里，就会产生

遥拜，第二次大战期间，为了强化对天皇的忠诚和服照精神 强制日本人民每天向东京皇宫方向郑重鞠躬。这一行为起始于军队。

不安和感到缺少什么。这是一种心理性的中毒。如把他从这种机械式的生活日程表解脱出来，他就会感到犯了禁忌一样，不按每天的日程表干点什么，心里就不得安宁。人完全成为纪律、服从的中毒者，受纪律约束方感愉快。一毕业于士官学校的人说：“挨一顿打感到痛快的人比挨打后嘟囔不已的人有出息。”（《日本军队》）

违反纪律受暴力处罚而感愉快，这与被虐狂心理相似。被虐狂自己要求责打，并认为是一种快乐。这已接近这种心理状态。令人感到如同带着枷锁的人，喜欢尝受越狱后被抓回来的毒打的滋味一样。

以后将会说到日木的“精神教育”，一切都集中于培植这种可以称之为“日本式被虐狂”的心理倾向上。

这样的训练 战争期间 不只军队 在学校、家庭里 也被强制或被奖励实行。产业报国运动的领导人某实业家说：“父老、师长、长者让你们追随他们 不准你们任性 严厉地管教你们 象把铁炼成钢一样 使你们养成习性 不动摇 强而有力。”（大仓邦彦《产灵的产业》，1942年）

这种“习性”在产生“无我”的服从习性的同时 还产生了“不触犯鬼神 鬼神不作祟”、“唯唯诺诺”、“八面玲珑”的习性。

### 3. 不触犯鬼神 鬼神不作祟

随着绝对服从命令的习性增强，不久，将扩大为不论对何事都消极随和的习性。

服从的习性表现于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事大主义的行动，而上述消极主义不仅对地位高的人，对同等或比自己地位低

的人，也采取八面玲珑主义。

在花柳界<sup>①</sup>和艺人中有许多人信奉的淘宫术<sup>②</sup>，依生辰八字占卜命运 指导人的修养。其中以伊藤博文<sup>③</sup>为例 劝说人们学八面玲珑。

“(伊藤公)处世最重要的是八面玲珑主义，不触犯人，不树敌 时时想到让人爱 总是八面玲珑 讨人喜欢。不论何事 总是闹别扭、讲怪理的人是令人讨厌的。——

“世间事‘依高见’ 贵人前答‘不知’。

“将此歌铭于心随时付于行动，从而时来运转发迹的人并非少数。”

就是说 不论对谁的话 都说‘依您高见’而遵从 自己表示“不知”之后，决不发表意见。这是从服从的习性向被动的习性扩展。于是对一切事都不采取自发的态度。外国人看到的日本人的谦让客气、缩手缩脚、犹豫不决，很多是这种服从习性产生的消极主义习性的反映。

这是因为自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就会被人说成“乖僻”、“讲怪理”而遭排斥。前面引用过的《结交人的方法》一书 说到对待前辈的态度说：“必须经常采取受教者的态度 毕恭毕敬。不准把自己置于对等的地位，要把前辈放在优于自己的位置上。” 不限于前辈 如果不论对谁都习惯使用‘依您高见’的处世法 不久对任何事物，就是有意见也都消极地回答“不知道”、“不自白”或者沉默。

① 花柳界 指传统的陪酒艺妓、娼妓的社会。

② 淘宫术，亦称淘道，产生于江户末期的一种算命术，是从中国的阴阳术演变出来的。淘为淘汰之意。宫是个人的星宿。

伊藤博文(1841-1909)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 在他任总理大臣时 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。 朝鲜被日吞并后，任第一任朝鲜总督。 1909年在我国东北哈尔滨火车站台上遭朝鲜义士安重根暗杀，

特别是农村，就是今天，沉默或“依您高见”的态度也很强烈。前面引用过的《农村的世态》一书介绍了一位经常出入东北农村做生意的商人经历过的事：某部落的农民“只附和我的话，不讲一点自己的想法。……他女儿的衣服的布料明显过于朴素，‘这布料很适合你姑娘呀。’‘噢是的。’那袖子短得可笑，‘这样的衣服干活很方便哪。’‘的确你说得对。’……令人感到他们对他人从未表示过反对意见。”

但这种八面玲珑主义，只是对人的表面态度，现实的行动未必是八面玲珑的。且听这位商人往下说：“虽然对上面那样的问题都大体作了附和的回答，但一到买东西时都很精明，看到这时的他们便会感到他们心里另有一套。……部落农民之间的交往谦恭有礼超出必要以上。”

就是说，回避与他人意见冲突的八面玲珑主义，还具有固执地贯彻自己的意志的反面。在这一点上，消极的习性同服从的习性一起，起着某种意义上的防止生活危险、维护自我安全的作用。

服从也好，附和也好，本来就是起于期望安全的心情，它的“无我”实际是与利己主义相通的“无我”。虽非现代意义的自我主张，但作为利己的方便之门发挥着作用。

正因为如此，就象下面将说到的那样，战败之后，服从的纪律松弛、崩溃，服从底面的利己心猛然涌于表面，掀起炽烈的私欲之争。

这样，服从和消极的习性就象利己心的伪装烟幕，起着强化利己心的作用。

## 4. 做自己所好之事

可是，服从和由此产生的消极的习性，并不能把人完全变成奴隶。它不能抹杀人格中心的自我。就象刚才说过的那样，如果服从的禁锢因某种机会，被放松或被解除，在此之前，一直被关闭的自我，就会以种种形式，开始表现它的存在。

但日本虽经明治维新并未成为彻底的近代社会，因此，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，并没有确立自由的个人的自我的社会基础。

福泽谕吉<sup>①</sup>早在《文明论之概略》中，论及过此事，他说：“古来日本称义勇之国，……武人宛如放荡不羁，然此种放荡不羁之气象，非自一身慷慨而发，非一男儿有享身外无物一己自由之乐之心，必非因外物之诱而发，即借外物之助而生者也。”

这个“外物”据福泽说，是先祖、家名、主君、父亲、身分等，因“日本武人”没有“独一个人的气象（individuality——个性）”。

福泽是最早积极倡导个人自由的日本人之一。他说：“人之自主自由独立至关重要，误此一义，无以修德、开智、治家、立国，亦无期天下独立。”

可是，福泽所期望的健康个人主义、主我主义，自明治以来至今天，并未能普及到日本人中间。虽然，进入了一部分思想家、政治运动家之中，但如前所说，对于日本国民大众的大多数

<sup>①</sup> 福泽谕吉(1835-1901)，明治时代思想家，幕府末期曾数度随幕府使节周游欧美考察。《文明论之概略》著于1875年，是他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代表作，其中批判了日本传统文明的不合理性。晚年沦为国权主义者，并力主日本“脱亚”。

来说，时至今日也是无缘的。

然而，民众在绝对服从之中，也曾设法追求表现自我。于是在强制绝对服从权力的时候，出现了两种表现方式：

第一种，如前所说过的那样，戴着服从的假面，适当地实现利欲、利己主义的目的。这种方式，自我主张终局停止在满足利己心上，留下来的只是被利欲支配的奴隶的自我，而不是自由的自我。在小说《真空地带》中出现的兵长<sup>①</sup>自夸自己作奴隶的诀窍：“不会的，象我这样的人，一定能躲过参加野战。如今当上了兵长，不久满期，满期捞个伍长回家，这礼物不坏，当兵不是很有甜头吗？……”

这种利己主义也可以认为是对服从和强制的一种抵抗。好象一本正经当傻瓜，但‘捞甜头的兵’是作‘忠良士卒’的反面，在那种秩序中，不能不说是才智的证明。

大概受这种‘甜头兵’诱惑的士兵不会太少。

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们虽然表面上抱着不把成绩如何放在眼里的态度，但内心中很多人还是想出人头地，当个“甜头军官”。“毕业成绩决定优劣，赴任后也以此作为晋级的顺序。……因此需要争取好成绩。可是如果明确说出来，便会被人瞧不起，说：太拘于分数了。是要得个好印象，还是要好成绩，把两个矛盾的东西巧妙地统一起来，是困难的。因此，必须学习而又不大让人感到在学习。”（《日本军队》）

这样，服从反而引起利己心。在这里出现了日本人心理常有表现的二重性。

生存在固定、严格的秩序之中的人，只要不明确站在否定这一秩序的立场上，而在这一秩序的框框中，在不触法、不逆上的

<sup>①</sup>兵长，战前日本陆军士兵军阶之一。当时准尉以下的军阶是：曹长、军曹、伍长、兵长、上等兵、一等兵、二等兵。

范围内，又想吐出一一点自我之气，这就要会分别使用服从主义和诀窍主义。用方才引用的话说，即“把两个矛盾的东西巧妙地统一起来”。

越服从越需要诀窍。在考虑诀窍时，另一面的服从心将会活动，限制投机取巧的程度。

小说《真空地带》中木谷的话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。他说：“世上究竟哪里会有喜爱军队的士兵？我希望找遍日本同他见见面。……但当兵的不论嘴里怎么说讨厌军队，可是大家的心底都有为日本的国家尽职的心情。”

虽然不能说所有士兵都有为日本尽职之心，但象这里所写的那样，服从、奉公的心情和要求自由的心情混在一起，时而采取比较调和的诀窍主义，时而处于两面夹板之中。这大概才是实情吧。

可是这样的在服从假面之下生成的利己心，决不是明治以后的产物。

战争期间，被作为死的圣典而流传的《叶隐》<sup>①</sup>一书中，不只有绝对牺牲的说教 如有名的“武士道看破了死”等 同时也有这样的惊人之语：“人一生实在短暂 活着应做自己所好之事 在如梦般的世上 尽做不爱做的事 尝受苦痛活着 这是愚蠢的。这话如果往坏处想有害，因此作为秘话未说给年轻人。我喜欢睡觉。和现在的心境相应 我想 闭户不出 睡觉度日。”

这是《叶隐》一书的口述者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、忠臣山本常朝（又名神右卫门）因殉死受国禁不能如其愿 隐居在草

<sup>①</sup>《叶隐》流传很广的武士道著作 共十一卷 又称《锅岛论语》。作者山本常朝（1659-1719）是佐贺藩第二代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。1700年光茂死，山本欲立即为主殉死，但因光茂生前已禁止殉死，不能完其殉死之志，遂出家隐居。后在草庵中，口述锅岛家武士之道和自己的心境，由田代阵基笔录，1716年成此书。

庵里讲述的一段话。

这一武士的“秘话”，明显地暴露出在严格的封建制度下的诀窍主义和利己心。正象谚语所说：“被追问时纹丝不露，自自时泄露了天机”颇有意思。

## 5. 弱者不可侮

强制服从，不仅产生作为消极抵抗的利己心，而且也会引起对强制权力的积极的反抗心。然而这种反抗未必只限于政治运动那种反抗和变革的形态。尤其日本的社会，明治以后也继续通过国家权力实行着服从和压制，阻碍了近代的社会革命、人的革命的进行，因此容易表现为与利己心纠缠在一起的“自我中心主义”而不是采取反抗或正面否定权力的形式。

这不是导向确立现代的自我而是以“个人自由”为标榜将人引入任性、随心所欲的倾向。而任性与建立在承认他人的自我、承认人性的尊严之上的自我主张相反，是从对人不信任和轻蔑人出发的。

本来，自由的自我，是通过自己消除服从和压制，解放自身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的。可是在日本国家的权力连这次的战败，也不是通过国民的手而是靠敌国的力量击溃的。获得的“自由”是取代国家权力的占领军降赐的。这是与投降交换而得来的被动的自由、被命令接受自由。

因此，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，对权力的反抗，并未直接地沿着社会革命、人的革命的潮流而进最多不过以“自我中心主义”的爆发而结束。

由于不是以自己的手打倒至今强使自己“无我”的权力，其